

迈向组织化党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

张现洪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是农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全国调研经验,从党建功能的角度建构政治化建设和组织化行动二维分析视角,将农村基层党建分为形式化党建、悬浮化党建、内卷化党建和组织化党建等四种类型,并分析了每种党建类型的表现、分布和成因。强政治化建设力度与强组织化行动能力特征的组织化党建,是农村基层党建现代化转型的方向。“一领三治”的政治结构为组织化党建提供了政治条件,组织化党建能够对基层公共权力进行再配置,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还赋予了基层社会以政治活力。分配型动员行动需求为组织化党建提供了时代条件,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资源的分配形成规则认同聚合和集体行动共识,实现对农民的“再政治化”。“群众路线”理论话语的鼎新为农村基层党建的转型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组织化党建语境中的群众路线有新的理论内涵。迈向组织化党建,需要以事务为线索、以群众路线为价值贯穿政治组织与组织社会,需要在功能上把下乡资源延伸为治理能力,需要将中央统合的总体性要求转化为地方的技术性实践,尊重农村基层党建的适配性与创造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组织化党建;基层党建;结构-行动;分配型动员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4)04-0037-1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1]。认识与理解现代中国,必须首先认识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和所获得的现代性”^[2],更较少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把农村工作提高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研究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对理解农村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目前学术界研究农村基层党建主要有两种视角:制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制度主义注重从党建组织、党建制度等角度讨论基层党建的内容与形式,讨论议题集中在党建的规范化及其引发的形式化问题。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化、制度化特征,如林尚立认为“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建设,是体现价值、保障党员、凝聚组织、发挥作用的根本。”^[3]这一结论是大多数制度主义研究者的共识,也构成了他们讨论的中心议题。制度化与形式化是一对“双生子”,党建规范性与党建

引用本文:张现洪. 迈向组织化党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4): 37-4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SH055)

作者简介:张现洪(1986—),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基层治理、技术治理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E-mail:zhangxianhong@ahu.edu.cn

实体化在基层实践中存在张力:一方面,党中央不断推进基层党建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另一方面,基层党建又出现了形式化、悬浮化等局面。为此,解释和解决这一现象与问题是对基层党建制度主义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从党建的组织架构上看,梁焯认为要区分组织口的“小口径党建”和党委政府的“大口径党建”,党建形式主义根源于基层将组织口以党务工作为主的“小口径党建”当作了党建的全部工作,并将其上升为政治任务,从而使得重视基层党建变成了重视组织业务工作^[4]。从党建的内容与形式上看,有学者批评部分基层党建呈现“自弹自唱”的形式化困境,主要是因为工作内容缺乏针对性、工作方法缺乏灵活性和工作要求缺乏规范性^[5]。从党建的手段与目的上看,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基层党建依然存在党建方式单一陈旧、成效不足的“内卷化”问题^[6],没有达到通过基层党建提高农村社会组织化水平的目的,形成了以形式应付形式的应付体制^[7]。

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注重从党建在基层社会中的结构与意义出发,讨论基层党建对农村基层权力结构、治理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议题集中在党建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功能主义一般在“国家-政党-社会”这一结构框架下展开对基层党建的讨论,其中组织论、统合论和嵌入论构成了三大主流研究范式。组织论主要从历史视野和宏观体制思考基层党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如徐勇考察了“政党下乡”的基本逻辑,认为正是“政党下乡”才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8]。区别于组织论,统合论一般建构一个地方性场域,从中观层次讨论在多主体的地方场域和复杂制度环境中,政党对其他主体的统合治理功能。如,何艳玲等发现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制度环境中的独特性,认为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松散型制度环境中发展出了统合治理模式,能够借助“党委统筹的项目制”“基层党组织体系扩展”和“党员骨干下沉”等机制重塑基层社会,并拓展复杂治理的能力^[9]。嵌入论在“国家-政党-社会”关系的认知上区别于前两者的建构色彩,认为社会是国家和政党的生成基础,政党有效组织社会的前提是政党把组

织、资源和关系等嵌入社会结构,强调了基层社会对政党组织的刚性约束。如,彭勃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为执政党的基层党建策略提出了新的命题,执政党运用基层组织嵌入社会的方式面临挑战,需要培育和统筹基层党组织多重政治功能,提升基层组织活力^[10]。

制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为我们理解基层党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两者在分析范式上既有区分也有相通之处,上述评述仅从研究侧重点和方法论上进行粗略区分和评价。总体来看,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对理解基层党建具有启迪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可进一步探讨的理论空间:第一,当前研究大都有着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而较少正视基层党建的区域性与复杂性。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一般把基层党建理解成一个亟待实现的政治“理想”,用目的论来看待基层党建的变迁而忽视了大国治理中的区域复杂性,不同地区基层党建的实体意义被党建的宏大历史叙事与庞大党政结构抽象和统一了。带着政治理想之眼去看基层党建,就只会看到基层党建实践中的失范与无序。第二,当前研究侧重国家、制度和结构的理论框架下的宏观审视,而较少涉及实践类型的中观审视,把基层社会当作基层党建的背景场域而非当成党建互动的发生现场,较少涉及基层党建事务过程性的深描。第三,当前研究有着现代政党建设理论想象力的枯萎,而较少关注革命话语与现代政治话语的承继与延展,理论创新有待进一步推进。

一、分析农村基层党建的二维视角： 政治化建设与组织化行动

要理解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建,需要把注意力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性质与组织特征上来。要推进农村基层党建的研究,需要引入更为丰富的理论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融性质、作用、角色、地位、使命、责任于一体的使命型政党”^[11],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代表与表达两大常规功能,而且还肩负着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新功能^[12]。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践行引领社会发展的

使命，党中央必须通过基层党组织来传达、组织和带动社会，那么基层党建就超越一般政党小切口的“组织党建”，而是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大切口的“实践党建”。在整体政治架构上，中国政治“呈现为执政党通过政治领导，在组织和意识形态层面深刻塑造并融入中国特色的政府体系而成的集中统一的党政结构”^[13]，表达为政治引领行政、政治统筹行政和政治融通行政的功能机制。在基层社会，基层政治就呈现为政党引领社会发展的“党政能动结构”，即基层组织要受到“党政结构”整体性的支配，表达为政治化建设与组织化行动这两种功能机制。所谓政治化建设，指的是基层党组织及党员以自身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自我完善的政治活动。政治化建设在基层一般展开为基层党组织在党中央的指令和号召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中央文件和领袖重要讲话等的政治理论学习，“三会一课”“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性党建活动及党务实践活动。所谓组织化行动指的是基层党组织及党员以群众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组织社会与引领社会的行动，是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体现。从政治化建设与组织化行动的二维视角来看，基层党建有向内和向外的二元内涵：基层党组织既有内生性的组织学习与组织建设的要求，也有着组织和服务群众、引领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基层党组织既要加强自身政治建设的能力，还要把自身的建设转化为进行社会动员、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

政治化建设与组织化行动分析框架也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而提出的。进入新时代，伴随着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先后实施，国家资源下乡如何激活基层治理，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对接自上而下的资源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14]。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要求要“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15]基层党建是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唯一可行抓手，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也成了破题的关键，这要求基层党建必须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建设，使之具备对接党政系统资源输入农村接点^[16]的能力，即加强政治化建设的能力；另一方面，要

加强动员与组织农民的能力，把国家输入的资源服务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增强群众对党和国家认同，增强党政系统的基础性能力，即加强组织化行动的能力。

二、农村基层党建的类型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和实践特性决定了基层党建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新时代赋予基层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也要求基层党建要不断往前迈进。由于社会基础不同，实践中的基层党组织对体制压力的感知及应对策略存在差异，其政治化建设和组织化行动的能力呈现出强弱不同的实践特征。如图1所示，农村基层党建的实践可划分为四种类型。本研究对基层党建类型学分析是笔者基于长期农村调研而进行的学术操作，政治化建设强度与组织化行动力度的大小是一个基于党建实践的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其具有历史比较和区域比较的意义，但不具备绝对量化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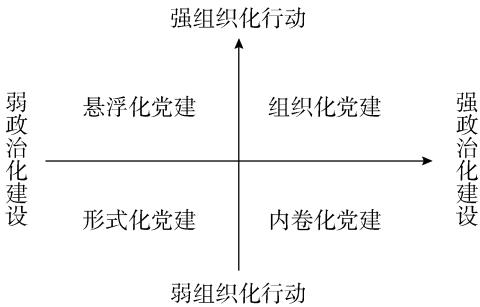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基层党建的基本形态划分

1. 形式化党建：弱政治与弱行动

形式化党建呈现出政治化建设力度弱和组织化行动能力弱的双弱特点。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欠发达地区的部分村庄和当前零星分布的“软弱涣散村”是此类党建的典型场景：在政治化建设方面，形式化党建主要表现为理论学习的强度达不到上级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落后，班子建设、党员发展与管理等组织工作不顺畅；在组织化行动方面，基层党组织政策执行能力和政治号召力较弱，对村庄社会的整合及带动能力不足，村庄治理失序。总体而言，该类型的基层党建处于一个相对低活力的状态，中央党建的要求和压力往往未能传达到基层，村庄内部需求未能得到及时回应，从而出现农村基层党组

织社会影响力建设的现实梗阻现象^[17]。

从基层党建的历史性考察来看,形式化党建双弱形态的出现主要集中于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到精准扶贫之前的这个阶段。从全国区域对比来看,形式化党建双弱形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且往往呈建制性分布,这也反映出该类型党建的出现更多是结构性因素导致。在农业税费收取时期,基层党组织需要向村民协商税费的分摊机制,即需要通过村庄民主与群众动员才能形成大多数人认同的税费分摊和收取方法并抑制“钉子户”。取消了农业税,国家既不需要通过群众工作从农村汲取资源,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反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性削弱,政治性建设的动力与资源不足,由此出现了基层党建的形式化。从村庄层面来看,一是该时期基层内生性事务性和党政体制赋予基层党组织的硬性发展任务都较少;二是基层党组织可支配资源不足,党组织缺少调动党员和村民的抓手;三是农村党员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不合理和党员净流出等因素,导致党组织队伍建设存在短板。总之,这时期的农村基层党建既缺乏政治化建设的体制性压力和内生性动力,也缺乏组织化行动的能力,呈现出形式化的特点。进入新时代,特别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先后实施,下达至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和引领基层社会的事务增多,逼迫基层组织重新走进群众,形式化党建存在的体制基础与社会基础等不复存在,当前零星分布的“软弱涣散村”则是村庄的偶然性因素所致,如地理位置偏远、村庄历史原因造成的巨额村债包袱等。

2. 悬浮化党建:弱政治与强行动

悬浮化党建呈现出政治化建设力度弱而组织化行动能力强的特点,“派性政治”和“宗族党建”是此类党建的典型场景。在政治化建设方面,悬浮化党建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到位,理论学习流于形式,特别是党组织班子建设和党员发展等队伍建设受派性或宗族结构影响,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遭到破坏。在组织化行动方面,该类党组织又呈现出表面上的强行动力与执行力: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可以选择性地完成上级任务和回应村庄社

会的需求;另一方面,普通群众被动员、组织和裹挟,基层党组织有一定的行动能力,甚至可以形成对上级党委的对抗性力量。例如,南方部分宗族性村庄的党建,“南方宗族性地区村干部是由过去宗族的民间性权威转换形成体制性权威”“很多情况下都是站在宗族利益上如何应对外来的国家政策”^[18];再如黄淮海地区的部分小亲族村庄的党建,“派性政治使得村庄生活和村干部的日常工作政治化”^[19],派性政治成为基层党建的支配性逻辑;又如东部部分利益密集型村庄的党建,“书记和村主任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也有独断决策的勇气,普通党员很少有话语权,党员组织生活徒具形式”^[20]。基层党建面临着由阶层分化所导致的派性政治,“村庄党建工作的实践中出现了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博弈”^[21],基层党组织就成为无法引领社会的“悬浮”组织。

弱政治化建设和强组织化行动这一对看似反常识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其核心逻辑在于强组织化行动并非党领导下的组织化行动,而是村庄社会的自组织行动——行动逻辑失去了政治规范性,行动目标也就偏移了政治正义。党组织代表的公共性让步于派性或村庄内生的小群体私利,基层党组织异化为精英谋利的竞技场。在宗族性地区和社区,“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村庄内部力量——村民和以村民血缘为纽带组成的宗族”^[22],村庄一般是同宗同族的单姓村,村庄是以血缘远近为组织原则的封闭型关系网络。基层党组织与宗族组织形成了结构上的契合,党支部实际上生长于宗族内部并受其结构性影响。问题在于,宗族的公私观念实质是宗族群体性“大私”而非真正具有普遍政治正义性的“公共”,在此逻辑支配下的宗族行动策略往往是自利的。如在黄淮海地区,小亲族的“门子”社会结构是基层党组织派性政治的社会基础,村庄权力结构与“门子”结构具有同构性,“门子”与“门子”之间围绕村庄权力的争夺就发展为以“门子”为主要单位的派性斗争。村级党组织成为“门子”竞争的“舞台”,村支部书记的职位成为“门子”竞争的“标的”,公共性资源的分配及村庄社会中的地位(面子)等被视为派性斗争胜利者的“奖励”。这样的

结果往往是强势大“门子”主导了村庄政治,能够动员自己的势力完成上级任务并照顾到小群体的私利,那么弱小“门子”和一般村民就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值得注意,该地区悬浮化党建虽有派性偏向,但上级党委往往成为调和派性斗争的中间性力量。然而,东部发达地区因阶层分化造成的派性政治却呈现另外一种逻辑:某几个村庄经济精英围绕利益分配形成派系划分。主要原因在于,土地等资源构成村庄发展的先决条件,谁掌握了村两委,谁就掌握了宅基地审批权等经济发展要素的分配,谁就掌握了发展党员乃至接触或进入体制等政治机会的分配。

以上几种悬浮化党建表现各异,但内部机制是一致的:基层社会内部存在内生性的自组织结构或动力,如宗族、小亲族或利益分配,社会自组织的逻辑反过来影响党组织的建设逻辑,甚至倒逼党组织建设适应村庄内生性结构,使基层党建悬浮于社会之上。基层党建“嵌入论”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基层党组织与村庄社会结构、自组织目标并非完全契合,而是存在着政治价值与组织策略上的分歧与张力,“嵌入论”实质是把基层党组织进行策略性的政治降格。

3. 内卷化党建:强政治与弱行动

内卷化党建呈现出政治化建设力度强但组织化行动能力弱的特点,当前“文牍党建”是此类党建的典型场景。在政治化建设方面,基层政权对基层党建进行资源过密化投入,基层党建的建设强度和频度都很高,有着中心任务化、标准化、程序化、文牍化等特征,但并没有转化为党对基层社会的引领能力,具体表现在:一是党建工作体系化,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党建任务和压力通过各级党组织内部层层高压传导,乡村两级都被高度动员起来进行党建。党政系统建立起一整套包含责任压实、活动开展、督导检查 and 绩效反馈等一系列标准化、程序化的体系来推动党建。二是党建工作专职化,乡镇和村庄都有专门的部门(如党建办)或者文员(党建专员)负责党建工作,甚至东部部分村庄还出现过党建工作市场化外包的现象。专职化后的党建工作又呈现“留痕主义”“文牍主义”等特

征。三是党建话语运用的高频化与空泛化。“以党建为核心”“党建+”“党建引领”等成为基层工作的万能政治话语,反而掏空了“基层党建”具体实质指代,造成基层对党建理解上的空泛化与庸俗化。

内卷化党建的出现是近年来党中央不断加大基层党组织建设力度的意外后果。令党建工作最为困惑的地方在于:为什么基层党建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却没有转化为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能力的提升?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基层形成了对党建压力的应付机制,中央对基层党建重视的政治势能与基层党建的内卷高压被体制内的应付机制所释放,政治建设的强度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建设的深度,也没有转化为面向群众的组织化行动。所谓应付机制,就是把基层党建的责任和压力通过高密度的动作、高标准的材料和繁杂的形式化工作在党组织内部消解,没有或者较少产出政治价值。内卷化党建的应付机制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留痕”式应付、“自我设定式”应付与选择性应付。

在党政体制内部的政治化建设方面,应对方式以“留痕”式为主。基层党建一般以“三会一课”为形式,以“两学一做”“党史学习”等任务为内容,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调研发现,党建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完成中央规定动作(交纳党费、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党章党规等),自选动作也以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和贯彻落实中央统一部署的任务为主。党建用力的方向是做台账、数字化平台打卡、过程展示等,党建成了以过程留痕为主要特征的合规性政治展演。201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坚决杜绝简单以设机制挂牌子安排村级组织任务、以填报表格或者提供材料调度村级组织工作、以‘是否留痕’印证村级组织实绩等问题”^[23],但是部分地方却出现了以“开会落实”等“以新形式主义反对旧形式主义”的基层实践悖论^[24]。

在基层党建的制度设计上,中央实际上给基层留下了足够的自主建设空间,对党建内容的要求有规定工作和自选动作两类,其中自选动作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让基层党组织依据地

域性、个体性特征来进行自主创新,最典型的制度设计就是以党建促工作的“问题清单”制:上级党委要求基层党组织依据自身发展要解决的重点、痛点和难点,自主制定工作任务清单,再依据问题清单形成一个上级对下级的督查机制。上级党委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留足基层创新的空间;二是在基层可接受的基础上形成考核压力,强化党建抓手。这一制度在乡村两级的基层党建部分实践中演变成“自弹自唱式”的党建政绩制造游戏。基于避责逻辑,基层党组织常常会把本来就应该完成的任务和容易解决的小问题放进清单,而那些创新性的活动、群众真正关切的大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放进清单,以免完不成被问责。“问题清单”就成了完成任务量的“应付清单”,创新空间被常规工作、细琐工作过密化堵塞。此外,村级党组织的行动策略还出现了选择性动员和部分化整合以应付党建,主要表现为党支部只能选择性地对积极分子、村支部成员进行高强度动员,对少部分村组进行高强度整合,政治化建设变成少数党员的事,组织化行动也只面向部分群众。

4. 组织化党建:强政治与强行动

组织化党建呈现出政治化建设力度和组织化行动能力双强的特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土八条”“幸福村落建设”^①等部分省市探索创新的“引领式党建”是此类党建的典型场景。该类党建既强调党建活动的规范性,又强调党建活动的实务性,能够在基层组织内部进行高度整合并赋予政治化建设以政治价值和实质内容,特别是在队伍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方面有着较高的组织活力。高质量的政治化建设把党组织内部政治整合能力转化为对社会的政治领导和发展引领能力,党建的内容与村庄事务高度相关,能够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社会的生活或生产资料,进而增强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

当前,组织化党建仅仅是各地涌现出的典型,尚没有形成区域性的地方实践,需要进一步提炼经验和总结规律。总体来讲,这些典型具有以下共性:一是用规范性的政治化建设进行组织内部整合,增强党组织的政治能力。组织化党建党组织对党建资源和党员队伍的整合意

识和整合强度都超过其他类型的党建。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通过志愿活动重塑党员的荣誉感,通过开会议事让党员真正参与村庄重大决策,激活党组织^[25];“土八条”通过量化考核和群众评议对党员队伍进行整合,激活党员的身份意识;“幸福村落建设”通过把党组会议制度化、党小组下沉到理事会等形式整合党员队伍^[26]。最重要的是,党组织对资源和人员的整合抓手就是思想政治建设,是通过增强党组织的政治能力来带动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方法是核心,这才是基层党建政治化建设的精所在。二是用干部-党员-群众的梯次调动机制,对党员进行调动进而组织和带动村庄社会。党员的思想认识、行为偏好与基层党建组织的认识水平、组织水平高度相关,党建引领党员,党员引领群众,党员是勾连组织与群众的关键中介。从基层社会组织化的角度来看,党员是一种政治代表身份,具有超过一般村民代表的政治参与权利,同时,党员还是村落社会的先进分子。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等调动党员,党员再通过启用政治与社会机制来引领群众。三是通过资源下沉与服务下沉,基层党组织在做真正的群众工作而不是做组织工作、部门工作。组织工作常常会陷入务虚,部门工作往往受限于科层体制,对下级或员工的工作方式往往是通过纪律、命令和督查。资源下沉与服务下沉是真正的群众工作,本质是将政策、项目、任务等通过说服教育群众和组织带动群众的方式在基层落地,工作方法灵活机动,因地制宜。党组织对群众是政治引领而非政治统领,在于对群众赋能而非通过命令将群众客体化或直接替代群众行动。

三、组织化党建:农村基层党建现代化转型的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山东省烟台市(2021年)、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2023年)等地的基层党建实践,“土八条”是河南省济源市(2019年)的基层党建实践,“幸福村落建设”(2021年)是湖北省秭归县进行的基层党建实践。括号内的年份是笔者调研的时间。

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27]67} 进入新时代,推动基层党建的现代转型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必然选项。统观以上四类党建,可以看出农村基层党建的转变路径与未来方向。如图2所示,基层党建转型的实然路线以实线箭头标识,组织化党建才是基层党建现代化转型的方向,转型的应然路线以虚线箭头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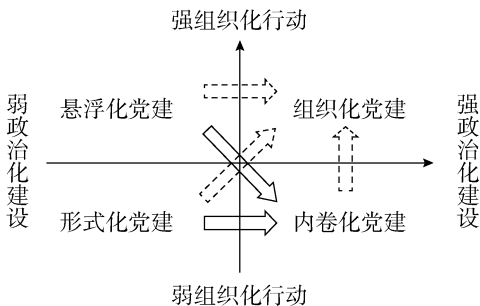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基层党建现代化转型的方向

形式化党建和悬浮化党建的出现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或社会基础,而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总体思路是加强党的领导。进入新时代,区域性的形式化党建得到了系统性治理,目前主要以“软弱涣散村”的形式零星出现。悬浮化党建的转型是一个历史性过程,社会自组织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党建引领与社会自组织之间存在张力,表达为私逻辑的派性政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后,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张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内卷化党建是目前党建的主要形态,但是内卷化的出现是党中央不断加强基层党建强度的意外后果,需要进一步探索政治化建设的强度转化为群众工作力度的机制与路径。组织化党建的难度与强度都高于一般类型的党建,其既有制度规范和价值正确,也有党建的在地化转化与灵活实践,是基层党建的“应然”形态。代表着基层党建现代转型方向的组织化党建虽然只是近几年以地方性的典型零星出现,却也证明当前已经具备了党建实践创新的现实基础,基层党建现代化转型的时代条件已经成熟。

1.“一领三治”的政治结构要求组织化党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体现出全党对乡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功能定位的再一次突

破性认识”,是属于“中国近百年的乡土重建探索”的一部分^[28]。基层党建整体上从政党嵌入社会的视角走向了政党组织社会视角,基层党建重新塑造基层政治结构,党组织成为核心的社会组织资源,形成积极导向的“基层党政能动结构”。从治理层面上看,“三治融合”并不能恰如其分地概括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治理架构,党建引领下的“三治融合”即“一领三治”政治结构才是组织化党建成立的前提。

形式化党建和悬浮化党建的共性在于政党对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的不足,其启迪意义在于,基层政党必须在结构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基层党组织悬浮或缺位的情况下,基层社会要么出现了活力不足的现象,要么出现自组织的功能替代,社会秩序走向丛林法则的派性政治或走向血缘规则的宗族政治,偏离人民性、发展性的政治导向。内卷化党建启示,政治结构上的主导和党组织内部架构的完善并不必然带来基层党组织能力与活力的增强。唯有组织化党建对基层公共权力进行了再配置,这种配置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还赋予了基层社会以政治活力,其政治结构上的特殊性在于“党建引领”改造了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结构,在村民自治框架下找到了更恰当的运行机制。

“一领三治”需要处理党组织与基层社会自组织之间的结构张力,需要处理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组织张力,其张力释放的基础是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统合能力以及相配套的简约治理能力。社会自组织一方面可以成为基层党建的积极性力量,内生的社会结构是组织农民的天然组织资源,嵌入论的立论点就是把党建组织建在社会自组织之中;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基层党建的异质化力量,内生的社会规则与行动策略可能会扭曲党组织的纪律性与规范性。基层党组织是对社会自组织的扬弃,“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29]从悬浮化党建迈向组织化党建,就是加强党组织的引领能力,抑制社会自组织的私利倾向,发挥社会自组织积极性的一面。因此,坚持和稳固基层社会

的“一领三治”政治结构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要求组织化党建。

2. 分配型动员的行动取向要求组织化党建进入新时代,基层党建的制度化建设、组织化建设已经走向规范化的新高度,甚至造成了政治化建设的内卷化。基层党建的现代转型方向应该从制度党建、规范党建走向地方多样化党建、实践党建,背后反映的是从制度主义走向行为主义取向,反映的是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有着明确的强行动要求。

这也与新时代条件下基层党建承担的历史任务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7]³⁰⁻³¹。接下来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中央对乡村的输入资源的大方向不会变,通过资源分配并把资源转化为国家的基础性能力,这是基层党建面临的核心的政治性要求。“在资源分配过程中,通过党建领航,发掘积极分子,动员村民参与,激发村庄活力,形成分配型动员体制。”^[30]新时代的“分配型动员”是在“现代叙事”中展开,资源下乡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动员提供条件,通过分配型动员同步生成基于资源分配的公共规则与公共物品^[31],即通过对资源的分配形成规则认同聚合和集体行动共识,实现对农民的“再政治化”,建立一个高度组织、深度动员的强社会以适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基层党建现代转型的行动取向。

3. “群众路线”的政治话语鼎新要求组织化党建

“中国式现代化”论断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现代化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得益于“中国特色”话语的调和与统合,西方现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能在中国政治学竞争性地存续,但建构稳定发展的中国政治学话语需要反思这两种话语遗产^[32]。组织化党建既是基层党建实践的转型,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理论话语的承继与鼎新。

“群众路线”这一话语表述贯穿了基层党建的百年实践史。“无论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33]组织

化党建语境中的群众路线有新的理论内涵:首先,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基层党建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同于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基层党建进入新时代后对群众调动是“分配型动员”,重点在于引领群众。形式化党建和悬浮化党建是引领群众的缺失,内卷化党建是引领群众的失败,只有组织化党建是以群众为对象真正引领群众的基层党建。其次,“群众”话语本身也代表着一种规则与秩序。基层党建中的“党群关系”体现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秩序张力:一方面,要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另一方面又要组织群众、引领群众。在此秩序与规则下,群众有两种形象:一种是作为主体的形象,一种是作为客体的形象。作为主体的形象,群众是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不可或缺的贡献者,组织化党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基层党建对群众进行了赋能,激发了群众发展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如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34],实际上就是增强基层党建群众参与的一面。作为客体的形象,群众是需要被治理对象。近年来,党中央通过党建对基层进行了深度的现代化引领,如“厕所革命”就是对群众的生活治理,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深度介入农民日常生活与改造农民生活世界的逻辑”^[35]。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在群众路线的理论话语中是统一的。最后,群众作为对基层党建的评价应该具有主体性地位,“治理有效”应该是基层党建的绩效追求。纪委下乡、监察下乡与督查下乡都已经证明了“科层”式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到群众中去”的自上而下的考核与评价固然重要,“从群众中来”自下而上的评价更不可或缺。群众作为基层党建的对象,须有相应的评价权。“治理有效”的价值性重归群众,“群众路线”话语在新时代的鼎新为组织化党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

四、迈向组织化党建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乡土重建探索的新尝试,中国共产党引领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任务要求基层党组织向组织化

党建迈进。

1. 从“政治组织”到“组织社会”的路径贯穿

新时代基层党建的现代转型有着明确的行动要求,要求基层党组织在配置下乡资源的同时还需对基层社会进行基础权力再配置,构造出更为恰当的政党组织社会的政治机制。组织化党建的“组织”一词“在中国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甚至是一种情怀,并且仍然是非常迫切的基层治理目标。”^[36]组织化党建也包含着两个“组织”的内涵:一个是作为名词的实体化的“基层党组织”,这是组织化党建面向政治的组织单位,是组织化党建起点和前提;一个是作为动词的实践取向的“组织起来”,这是组织化党建面向社会进行分配型动员的组织实践。迈向组织化党建,就是贯穿两个“组织”,从强化政治组织单位贯穿到强化组织社会实践。从强化政治到组织社会的路径贯穿,本质上是打通政治化建设与组织化行动之间的壁垒,传统的基层党建容易陷入“组织陷阱”——试图从单向度的组织制度建设来加强党建,而忽视了组织社会的行动,这需要在以事务为线索、以群众路线为价值统领基层党建实践。

以事务为线索需要突破“组织陷阱”,用事务来统领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中央的政治性要求以事务为载体落实在基层,将政治指令与基层事务相统一。中国共产党诚然是一种政治组织,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政党一切内部治理行动蕴藏着深刻的工具理性意蕴”,其执政的终极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服务于革命、建设、改革等政治任务^[37]。这些政治任务的落实,表面上看是宏观的政治化建设,政治指令构成理解基层党建的线索,实质上是指向具体的基层党建实践,表达为基层治理事务的推进,用事务的推进体现政治化建设。

以群众路线为价值就是要突破自上而下的党政科层组织逻辑,引入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视角,将中央的部署与要求与基层的群众路线实践相统一。调研中群众谈到党建时讲“基层干部把中央的经念歪了”,这句话形象地指出了基层党建存在的一大问题:基层干部将中央

的部署与要求与基层的社会化行动对立起来,没有理解群众路线从中央到基层的价值贯穿性。此外,调研中发现,从政治组织到组织社会的贯穿还需要跨越“技术陷阱”。目前以新数字技术为手段是基层党建创新的主要形式,这符合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是通过党建引领不断开展组织再造和制度重塑而形成‘党建+’的过程。”^[38]信息技术赋予了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贯穿能力,但也是造成内卷化党建的重要因素:基层党务工作者困在党建系统界面中无法自拔。因此,迈向组织化党建,需要重视技术贯穿组织层级所带来的赋能和负能的双重效应。

2. 从分配资源到治理能力的路径延伸

中国农村迈进资源下乡时代,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先后实施事实上构造了国家资源大量输入到基层社会的政治体制,“基层政权从汲取型转变为输入型”^[39],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资源配置。以分配资源为抓手,强化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政治作用,这是基层党建迈向组织化的第一段路径。问题在于当前农村基层面临着“好事不好做”的实践悖论^[40],干群关系处于相对松散状态。迈向组织化党建还有第二段的延伸路径:将资源分配转化为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进而引领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实现好事好办、好事办好和做好事有好评。

组织化党建区别于其他三种类型党建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打通了政治化建设与组织化行动之间的关联,即组织化党组织的建设路径不仅在基层党组织内部用力,而且注重在基层党组织-人民群众的关联上下功夫,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进一步延伸。从各地组织化党建的实践经验来看,路径延伸的具体机制主要有3个:第一,在资源分配方向上将政治引领与群众诉求相结合,构建党群互动中议题设置的路径延伸。国家资源下乡的目的一是通过公共性事务建设来服务群众,二是引领群众迈向现代化,即国家下乡资源的配置既要体现群众诉求又要体现国家引领群众的意志。两者相结合的途径即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活动设置资源配置的项目议题,这一方面要发动群众参与政治生活来

设置项目,另一方面要引领群众和教育群众,将下乡资源建设为群众福利的同时注意资源下乡的政治效应,这样才能好事好办。第二,在资源下乡的实施过程中将科层制运作与群众动员相结合,构建党群互动中项目实施的路径延伸。资源下乡的方式是项目制,“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41],以基层党组织为代表的基层权力系统和以基层党组织来动员群众的社会运动机制相结合,才能使好事办好。第三,在资源使用绩效的反馈上将技术性验收与群众评价相结合,制造治理绩效反馈路径的延伸。在以往基层党建的评价体系中,一般“要求发挥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示范带动作用,依照党建考核标准开展目标管理”^[42],属于党组织内部单向度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将面向社会的组织化行动纳入考核范围,“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行效能评价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43],构建群众参与的复合型评价体系才能做好事真正有好评,将资源下乡转化为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上来。

3. 从中央统合到地方策略的路径转换

从执行层面上讲,迈向组织化党建还需处理基层党建的“统分关系”,考虑到不同社会经济基础与组织化党建的适配模式。从基层党建的类型学分析来看,形式化党建、悬浮化党建和内卷化党建的生成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环境,中央对全国基层党建提出的统一、抽象的总体性要求,需要转换为基层落实为组织化党建的地方性、具体的技术性实践。总体来讲,由于各个村庄的社会结构、政治基础和观念认同不同,基层党建具体的展开机制和行动策略都不同。当前的基层党建要从政治效能方面强化,在制度规范性方面松绑,把重点放在规则认同聚合和集体行动共识的达成上,尊重基层党建的场域在地化和行动策略的创造性。迈向组织化党建,将中央统合的总体性要求转化为地方的技术性实践,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的转换。

第一对,中央统一性的政治要求与地方区

域性特征的适配性转换。中央对基层党建的要求是基于全国一盘棋考虑的,地方在党建队伍、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等多个方面具有区域性的特征。一是从党建队伍来看,江苏省多数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干部基本上是专职化的,党建队伍强大;浙江省多数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干部为兼职化干部,党建队伍相对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的党组织干部多为半专职化,既没有像江苏那样实行坐班制,也没有像浙江那样实行完全的兼职化,而是实行值班制。二是从社会结构来看,发达地区的村庄社会结构完整,基层党组织的党员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业结构更为合理,大学生回村党员成为村庄党建重要的建设性力量。但是中西部地区的村庄社会结构多为留守型,农村党员老龄化严重,学历结构有待改善,大学生党员党籍回村务工在外成为“流动党员”,反而成为村庄党建遇到的难题。三是从经济基础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多数有一定的活动资金,面临着大量的村庄治理事务,群众对基层党组织也有着较高的经济引领期待。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村庄经济基础薄弱、组织能力受限等问题,群众对党组织的经济期待是维持型兜底。那么,当中央统一性的政治要求遭遇不同的区域性条件,就需要基层党组织进行适配性转换。如,东部地区党建工作拥有更为丰富的人力、财力资源和更高的绩效期待,组织化党建是发展型适配,更侧重于动员和吸纳更多的力量,特别是年轻党员参与村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面临着人力和财力的资源约束,人民群众对党建绩效的期待更多是治理秩序的稳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组织化党建是维持型适配,侧重于通过“分配型动员”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将基层党组织比喻为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从组织定位上具有局部性,因此,迈向组织化党建需要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进行适配性转换。

第二对,中央抽象性的政治要求与地方基层党建具体实践的创造性转换。考虑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地方性问题,中央的部署与要求是高度抽象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提出,“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的总体要求就是抽象性的概念。这些抽象性的要求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可以在基层党建的实践中还原为具体的党建活动。如,中央提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44],那么山东省和安徽省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具体的创造性转化,这指向集体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然而,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基于有限的党建资源,通过提供基础性的农业生产服务来维持农村农业基本的生产秩序,维持村集体经济的简单运转也是具体的创造性转换,虽然这指向的是集体经济的简单再生产。那么,当党中央抽象性的政治要求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基层党组织,就需要其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将基层党组织比喻为党的“战斗堡垒”,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是群众工作的“前线”。因此,迈向组织化党建需要在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中进行创造性转换。

五、结 语

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是农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本研究所讲的组织化党建是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实践类型学的分析而尝试性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从党组织功能建构起政治化建设和组织化行动的二维视角区别于党务工作者从党务内容划分的“务虚”与“务实”的二维视角,这对既有的农村基层党建研究是一个尝试性突破。

基于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基层党建经验的摸底,本研究回答了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跳出“务虚”与“务实”的党务划分模式,建构了一个能够类型化分析和评价全国不同地区农村基层党建的理论视角,回答了什么是现代化的基层党建类型这一命题。另一方面,提出了组织化党建这一理想类型的党建模式,对组织化党建何以可能和何以达成等命题进行了学理阐释。本研究对基层党建工作者加强基层党组织工作能力也具有现实意义,提出的迈向组织化党建需要以事务为线索、以群众路线为价值贯穿政治组织与组织社会,需要在功能上

把下乡资源延伸为治理能力,需要将中央统合的总体性要求转化为地方的技术性实践,尊重基层党建的适配性与创造性。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不仅要有规则化和制度性的一面,增强其对资源的分配与转化能力,还有面向群众的组织化行动的一面,增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与引领能力。基层党建工作重心要进行适度调整,以此来适应农村整体性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2] 郑永年.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共十九大与中国模式的现代性探索[J]. 全球化,2018(2):11-19.

[3] 林尚立.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264-265.

[4] 梁焯. 基层党建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5-52.

[5] 颜俊儒,梁国平. 乡村治理视角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J]. 理论探讨,2019(2):145-149.

[6] 白瑾. 打破党建方式“内卷化”的怪圈[J]. 人民论坛,2020(9):86-87.

[7] 桂华. 论村级形式主义的体制性成因——基于乡村关系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2021(9):45-52.

[8]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 学术月刊,2007,39(8):13-20.

[9] 何艳玲,王铮. 统合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J]. 管理世界,2022(5):115-131.

[10] 彭勃,邵春霞. 组织嵌入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基层组织研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13(2):34-40.

[11] 唐亚林. 使命-责任体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态建构论纲[J]. 南京社会科学,2017(7):1-7.

[12] 唐亚林. 从建国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J]. 行政论坛,2017(5):5-15.

[13] 王浦劬,汤彬.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9(9):4-24.

[14] 贺雪峰,桂华. 农村公共品性质与分配型动员[J]. 开放时代,2022(4):51-61.

-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1-07-12(01).
- [16] 张现洪. 革命、改革与现代再造:村社集体变迁的历史逻辑[J]. 浙江学刊,2022(5):20-31.
- [17] 刘子平. 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影响力建设的现实梗阻及逻辑进路[J]. 探索,2016(5):108-112.
- [18] 陶自祥. 村庄结构视野下的南北乡土社会治理差异[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4):15-21.
- [19] 陈柏峰. 北方村庄的派性政治与日常生活[J]. 开发研究,2008(1):86-90.
- [20] 罗兴佐. 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J]. 长白学刊,2018(1):36-41.
- [21] 袁松. 发达地区农村的阶层分化与权力实践:一个研究展望[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3):85-90.
- [22] 刘良群.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J]. 江西社会科学,2007(6):252-256.
- [23]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N]. 人民日报,2022-08-23(01).
- [24] 王向阳. 当前留守型农村基层党建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湖北F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J]. 社会主义研究,2018(6):109-115.
- [25] 陈义媛. 以村集体经济发展激活基层党建——基于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3):107-117.
- [26] 余练. 农村基层微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其运行机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6):11-19.
- [2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8] 叶敬忠.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沿循、总体布局与路径省思[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64-69.
- [29]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 学术月刊,2007,39(8):13-20.
- [30] 贺雪峰,桂华. 农村公共品性质与分配型动员[J]. 开放时代,2022(4):51-61.
- [31] 桂华. 国家资源下乡与基层全过程民主治理——兼论乡村“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J]. 政治学研究,2022(5):27-38.
- [32] 郭台辉. 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J]. 探索,2020(3):62-75.
- [33] 郭广银.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18(5):19-22.
- [34] 王静.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97-107.
- [35] 刘燕舞. 生活治理: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视角[J]. 求索,2022(3):116-123.
- [36] 王德福. 社区人格化自治及其逻辑——兼论社区自治体系重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1):43-53.
- [37] 柳宝军. 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生成的时空语境[J]. 政治学研究,2022(4):14-24.
- [38] 陈潭. 党建引领、数据赋能与信息惠民——理解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三重界面[J]. 行政论坛,2022(5):37-43.
- [39] 桂华. 国家资源下乡与基层全过程民主治理——兼论乡村“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J]. 政治学研究,2022(5):27-38.
- [40] 杜姣. 村庄治理层次与村庄秩序供给——兼论国家力量如何进入村庄[J]. 教学与研究,2023(2):114-124.
- [41] 张现洪.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J]. 天府新论,2017(4):86-94.
- [42] 叶子鹏. 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评价标准研究[J]. 理论视野,2023(2):80-85.
- [43] 严郁洁,曹胜亮.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建构[J]. 探索,2023(3):39-52.
- [44]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2019-01-11(01).

Towards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ZHANG Xianhong(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s the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whole count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politicized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ed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building function, divides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nto four types including formalization Party building, suspension Party building, involution Party building and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and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distribution and causes of each type of Party building.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with strong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strong organizational action ability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Party building guidance and three governances” provides political conditions for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can redistribute grassroots public power, which not only ensures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endows grassroots society with political vitality. The demand for distributive mobilization action provides the era conditions for the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ource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need to form rules recognition aggreg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consensus through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so as to realize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farmers. The innov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the mass line” provides ide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and the mass route in the context of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has new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o move towards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ffairs as the clue and the mass line as the value to run through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xtend the resources to the countryside into governance ability in function, transform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central integration into local technical practice, and respect the adaptability and creativity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rganized Party building;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structure-action; distributional mobilization